

从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到精神生活 共同富裕的逻辑理路

卢德友 姜 婧

摘 要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生活方式,也是更高级社会形态的精神生活。马克思从社会生产的整体性视角对精神生产加以观照,不仅使其成为理解现实社会、构建人的现实生活的重要范畴,而且还对精神生产的未来发展路向作出科学预判。精神生产在人的认知活动、人的主体存在、人的历史过程维度上,都展现出巨大的社会价值。新时代的精神生产要增强精神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做到固本培元、返本朝元、因时而新以及因势而动,以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统一。

关键词 马克思;精神生产;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 B27;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5)02-0036-08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3MLB002)

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启的西方现代化,在创造物质财富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历史功绩,但同时也使西方民众普遍走向一个尴尬的生存处境:在物质生活繁华充盈的表象之下,精神世界苍白贫乏,空虚、焦虑、烦躁、无聊等心理,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稳步蔓延的内心常态;纵使人们试图在现代社会的丛林中追寻“诗和远方”,终究也会因现代性之“目的的晦暗”而沦为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者,迷失在通往家园的归途。如此一来,重拾日益沉沦的精神世界与找回渐行渐远的精神家园,成为西方在现代化之后的紧迫任务。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要实现社会结构的整体跃迁,还要在超越西方的意义上开创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在物质生活领域实现人民群众富起来的同时,也以丰富的精神产品供给为前提,保障社会成员达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从而克服西方现代化带来的窘境。据此,我们需要厘清这样一条问题之链:在理论源头上,马克思对精神生产的相关阐说从哪些维度为我们作出过澄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当在何种意义上对精神生产的价值加以据守?面向未来时,精神生活从生产到富裕再到共同富裕对接的原则路径如何实现?这些问题,不仅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关涉共同富裕的社会愿景,还从精神动力方面事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胜利。

一、理论辨正:马克思对精神生产的阐说

作为人类理解和把握世界的重要方式,精神生产并非人脑对外界的直观反映,而是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进行的系统性精神创造活动,从而产生出符号多元化的精神产品。在辩证唯物主义视域下,精神产品对物质实践活动具有的能动作用,本属毋庸置疑甚至常识性的认知范畴,但在马克思之前的黑格尔哲学中却绝非如此,精神的能动性被无限放大甚至被赋予本体论意义上的规定。

在“依照思想、建筑现实”^[1](P412)的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精神活动或精神运动是人们理解世界的特殊方式。以人通过思维确立自身的主体性为前提,精神生产就在能否彰显人的主体存在和自由意志层

面得到理解。黑格尔认为,艺术、宗教、哲学、科学知识的创造都属于精神生产范畴,并且精神生产也遵循植物那般“转变和先后承续”^[2](P4)的逐步完善过程。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依据正一反一合的辩证逻辑,探讨意识的运动轨迹和历程,将意识、自我意识、理性、客观精神等都视为意识发展的不同阶段,最终到达绝对精神这一自我运动的顶点。在黑格尔看来,精神生产是主体将内在精神进行逻辑外化,即精神生产主体将自身本质力量进行对象化的活动。殊不知,在这种以绝对精神主宰世界的抽象逻辑中,人类社会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被还原为思维中的纯粹精神活动,并且将整个社会历史都统摄进理性思维螺旋式上升的怪圈。纵然黑格尔试图强烈彰显精神活动的能动性本质,但依旧尚未达到自由的精神生产和创造,因为一切精神活动都必须臣服于绝对精神。不仅如此,其精神活动的能动性也只是在纯粹思维中展开,并未触及现实的物质生活基础,因而黑格尔始终未能把握精神生产的实质。

黑格尔以充满辩证意味的思维逻辑专注构建精神大厦,无疑将精神生产的现实性基础遗忘殆尽。马克思早已洞悉黑格尔精神哲学的缺陷,即表现出脱离现实内容的纯粹抽象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认黑格尔精神哲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3](P204),所谓精神运动只不过是思辨层面的运动,正如“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3](P205)。显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精神生产源自现实生活内容,它须臾不能离开社会生产实践的地平,并与人们的物质生活有必然联系。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论及物品的价值问题时首次使用“精神生产”概念:“物品的价值,这主要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甚至精神生产也是如此。”^[3](P270)在此,马克思尽管还没有从唯物史观的视角阐发精神生产,但已经认识到它同物质生产一样,都受到劳动时间这一生产规律的支配。《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式将精神生产的物质基础揭示出来。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们的思想观念都是物质活动的产物,与人的物质交往密切相关,尤其是与现实生活的语言紧紧相连。“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3](P524)这无疑表明两点:一是精神生产的基础乃是物质生产实践,凡是思想观念的东西都是人们物质生活的反映;二是特定民族的精神生产是其心理状态和生产关系的写照,进一步突出精神生产的民族特征和意识形态属性。“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3](P550)。这样,精神生产就在马克思那里得到清晰把握,即它是人们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观念形态的生产实践活动。同物质生产一样,精神生产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动态发展过程,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可见,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视野,将精神生产科学完整地阐明出来。

其一,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的重要内容。在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中,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生产相互统一、彼此影响,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延续。人类活动的第一个历史前提,就是要解决满足生存的基本所需,而物质生产通过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变换的方式来满足这一需要,被满足的需要本身又推动人自身的生产,即人口的繁衍。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始终受到物质的“纠缠”,这使得人们在物质交往和日常交流时又在进行精神生产。以此看来,精神生产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具有特殊地位,它在受制于其他两种生产的同时,也对其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也规定了精神生产的社会价值。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理论、道德意识、文学艺术等精神产品,集中展示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程度,同时也反映出人的发展水平,毕竟人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类发展的历程也表明:“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4](P591)可见,精神生产虽然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却影响经济基础并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后来的卢卡奇、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着力强调的阶级意识、“文化霸权”等,也是针对精神力量能动作用的匠心独运。

其二,精神生产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马克思认为,精神产品也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形式,它通过一定的感性物质形态体现出来。虽然精神产品能够以物的形式展现商品的价值,但其本质属性应在

文明价值的意义上加以领悟。因此,除了遵循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之外,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精神生产还具有特殊的“文明要素的生产规律”^[5](P345)。作为人类在实践基础上特有的活动,精神生产遵循美的规律来构造,而不像动物那般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6](P274)。不过,在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生产在物的商品属性方面被加以放大,导致精神生产只关注其带来的剩余价值,而文明属性的一面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直接违背了精神生产的特殊规律。正如后来瓦尔特·本雅明批判的那样,在西方工业化开创的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品那崇高的膜拜价值只能让位给展示价值,从而导致艺术品失去其本该具有的灵韵,昭示着资产阶级精神生产的日薄西山。

其三,精神生产带有明显的阶级烙印。在生产水平低下的人类社会早期,人们主要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以解决生存问题。由于尚未分化出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主体,人们只是在物质生产中附带进行初级精神生产,以此反映物质生产状况,如神话传说、岩壁绘画、原始装饰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劳动产品出现剩余,社会因共同进行物质生产这一劳动关系的破裂而产生出阶级,导致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生初次分工,诞生了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主体。本质而言,精神生产是人们物质生产和现实生活的反映,正如马克思所言:“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3](P533)然而在阶级社会中,精神生产却不一定真实反映人民的现实生活过程,更多是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统治阶级除了以强制暴力维护自己的利益之外,还通过政治、法律以及意识形态对之加以装饰巩固,精神生产遂以意识形态的形式为统治阶级服务。此时,精神生产代表着不尽一致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阶级诉求,统治阶级通过“君权神授”“奉天承运”等叙事方式,旨在贯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合法基调;人民大众则伸张“人民主权”“众生平等”的观念意识,质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阶级秩序。

其四,自由创造与人人共享是未来社会精神生产的特征。在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均衡协调,有力地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精神文化产品在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诸环节,都还原出本真的社会价值。在生产方面,自由生产、主动创造。精神生产不再受商业化的资本逻辑支配,而是人自由自觉活动的展现。自由的精神创造活动,使人不断确证和拓展自身的本质力量。在分配方面,按需分配、人人共享。共产主义社会要实现精神财富的社会共享,让每个社会成员都获得丰富的精神食粮。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在平等协作中共同生产,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分配精神产品,推动社会成员精神境界的极大提升。届时,人们摆脱社会生产的受动性,拥有充分的闲暇时间进行自由的精神创造。在交换方面,自由流通,交流互鉴。共产主义社会的精神产品将突破各种地方性知识,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自由流通。共产主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当全社会成员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时,人们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共享精神产品,以此促进社会交往尤其是精神交往关系的全面丰富。在消费方面,健康向上,回归真实。消费形成的新的需求对生产起着导向作用,或如马克思所洞见的那样:“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7](P9)共产主义社会,人立足于自身的真实需要去消费精神产品,从而摆脱虚假需要、过度需要的异化心理。精神产品内在的文明价值属性得以彰显,极大地推动人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可见,在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精神生产活动具有自身存在的历史因由。马克思从社会全面生产的整体性视角对精神生产加以观照,不仅使其成为理解现实社会、构建人的现实生活的重要范畴,而且还对精神生产的未来发展路向作出科学预判。在推动全体人民稳步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精神生产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再次得以凸显。

二、价值再现:精神生活的现实吁求

作为人类社会三大生产的内容之一,精神生产具有的社会价值不言而喻。虽然思想理论、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力量在具体实践中始终受到重视,但我们对精神生产本身的关注却显得相对不足。这种情况可能出于一种原则上的顾虑——过度强调精神生产或精神力量,恐有违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之

嫌。因此之故,目前关于该领域的研究依然存在巨大空间,尽管马克思在探讨人类社会的全面生产形式时,早已确证过精神生产的存在与功能。事实上,恰恰是基于唯物史观立场,我们才有必要客观辩证地看待精神生产及其社会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8](P20)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精神富有成为共同富裕的鲜亮底色。可见,追求精神生活的共富乃是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无疑赋予精神生产从理论走向现实的时代使命。在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人通过对事物进行加工创造出价值,精神生产亦是如此,它依赖人对客观存在进行能动反映和观念构建,从而形成自身的社会价值。新时代的精神生产面向人们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要,以回应人民群众在知识、道德、科学、艺术、审美等方面获得提升的美好期待。由此,精神生产的价值就一目了然,它“以其精神内容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扩展人的精神视野,提高人的精神品位,开发人的精神能量,活泼人的精神生活”^[9](P93)。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实情是,大众文化的兴起及其市场运行模式的展开,刺激资本强势介入文化产业,使精神生产和文化消费都无法摆脱商业化色彩的笼罩。如此一来,精神生产由于潜藏着巨大的资本利润而受到片面追捧,同时,为了获取市场价值而逐渐具有的功利性和逐利性,致使其塑造精神文明的社会价值出现被掩盖的势头。大众文化借助扁平化和批量化的生产方式,以商业化和娱乐化的传播特征,在当前我国精神文化消费市场中日益壮大。受此影响,文化消费中的哗众取宠、低级趣味、娱乐至上等现象层出不穷。当崇高的精神生活蜕化为世俗的沉迷享乐,伟大的意义和生存的价值将注定被消解,社会尊崇的核心价值观念势必会遭到冲击和弱化。

同时,在信息技术推动的数字化时代,精神生产的时间缩短与空间扩展并存,每个人都能借助自媒体终端设备成为精神生产的主体,这为创建人类美好精神家园提供无限可能。无论是大数据推送的海量偏好信息,还是个性化设计的文化定制符号,都从供给侧极大地丰富了现代社会精神文化产品,因而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遗憾的是,海量供给并不意味着高质量发展,这些眼花缭乱的精神文化产品往往形式大于内容,背后隐藏的流量密码和资本操纵折射出精神生产的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褫夺。譬如,人们在消费精神文化产品时,也在被数字算法进行智能分析;人们在接收大数据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时,也不由自主地被关进精致的信息茧房;人们越是依赖虚拟的数字化生存,就越是忘却自身的现实存在方式;等等。毋庸置疑,现代社会的精神生产方式的确更加丰富多元,精神产品在很大程度上能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但在物质生活走向充裕的社会条件下,精神生活不应在商业化、数字化的重重包围中步入空虚,相反,只要我们牢牢坚守精神文化产品的社会价值,它在现代社会被赋予的多样化生产方式将是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有利契机。

在人的认知活动维度上,精神生产为人类带来极大的能动性。从人类早期生产活动中的“结绳记事”到产生“数”的观念,人们就开始进行抽象思维,并使之与语言交织在一起推动文明的启程。之后兴起的原始神话、诗歌、绘画、音乐等,借助艺术的想象呈现出人类早期的社会风貌。通过世代口传、文字记录、原始艺术等方式,人类将精神产品保存延续下来,极大地开拓精神世界的领地。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精神生产也在以加速度方式推进,尤其是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的思维观念逐渐迎来深刻变革,精神产品随之大量涌现。同时,由物理学引领的近代自然科学发展,以工业革命为标志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巨轮。这样,精神生产既塑造出自由平等的人文价值观念,又展开了理性认知的科学价值追求,有力提升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可以说,人的大脑思维在精神生产的促进下,构成宇宙中最复杂的体系。精神生产超出人自身的感觉心理、本能意识,从而对社会进行理性加工和抽象反映,以极大的能动性去形塑现实的社会生活。譬如,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精神,而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正是由于意识到精神力量迸发的巨大能量,黑格尔、尼采等才以绝对精神、权力意志对之作出过度肯定。

在人的主体存在维度上,精神生产使人不断创生自身。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由于改造自然的能力不强,只能像动物那般被动适应环境,在自然面前普遍处于受动性地位。在物质生产实践

的深入进行中,人类不断提升改造世界的观念、方法和技艺,逐渐增强自身的主体性存在,从而使自身从动物界超拔出来。人的主体性在认知能力的不断增强中得以增强,古希腊的自然哲学着力探索世界的起源与构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基本呈现“人围绕世界旋转”的模式。直到康德哲学的产生,人在认识世界方面才实现“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哲学以人的先天知性为基础,高度自信地为人们认识世界制定基本范畴,无论世界万物多么神秘复杂,只要被纳入这些范畴就会被认识,以达到“世界围绕人旋转”的目的。由于实现“人为自然立法”,人的主体性地位得以确立。作为精神生产的重要结晶,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在征服自然和改造世界中迸发的巨大能量,无疑进一步加强了人的主体存在。在物质需求普遍得以满足的今天,人类更是愈加重视精神世界的丰盈。人生活的世界就是自己创造的,人“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3](P528),而是人实践创造的结果。可见,得益于精神生产的推动,人在不断创生自己的历史,使人真正成为人。社会历史的向前演进也须臾离不开精神方面的助推,倘若只有物质生产力的发达而缺乏精神方面的增益,并不表明社会真正获得发展进步。有时毋宁说,社会历史的前进往往以精神领域的变革作为先导,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五四运动等。我们所追求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其重要前提也是人们精神境界的极大提升。尽管如此,精神生产只有反过来先作用于人,再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能带来社会的变革。

在人的发展过程维度上,精神生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人的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归宿。人通过生产实践不断创生自己的历史,同时也在追求达到自由全面发展的状态。这指向人在体力与智力上的充分增进,即在物质生活充裕殷实的同时,还应在精神层面达到才能、志趣和个性的自由舒展。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物质产品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与此伴随的是难以抗拒的物质诱惑。对此,不少人醉心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和享受,逐渐迷失在物欲横流的丛林,任由精神世界单调苍白甚至塌方陷落。在物质生活得以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对丰富的精神生产理应成为一种内在渴求,那些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科学、文化、艺术等,都面向人类追求自由全面发展而敞开。如若缺乏相应的精神文明交相辉映,纯粹的物质发展也仅仅是器物层面的量的积累,而人在发展进程中质的提升则无从谈起。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们的物质生产劳动受资本宰制而成为异化劳动,导致整个社会的精神生产普遍发生异化,呈现出“后现代的精神危机”。相比之下,社会主义消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异化,为人追求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制度基础。习近平强调:“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8](P19)只要不断促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就是在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价值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10](P22)。鉴于精神生产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尤其是对人的发展昭示的价值维度,我们应当立足唯物史观的基础,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进行高质量的精神生产,以最终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三、需求回应: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当前,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但我们在人类社会总体进程中仍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令人鼓舞的是,社会建设已由最初的“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推进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新的历史方位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需要我们在全面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同时,创造出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以整体、全面地彰显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

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政治论断,不仅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方面的工作指明前进方向,而且为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新的任务与要求。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时代应有新作为。习近平强调:“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11](P36)不断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凝聚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和“最大同心圆”,才能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汇聚精神合力。为此,新时代的精神生产必须要着眼于有效供给,围绕人民精神生活的内容丰富、均衡协调、境界提升等,增强人民精神生活的获得感,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体而言,精神生产要在坚守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多向发力,增强精神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铸就凝神聚力、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一是固本培元——精神生产瞄准社会矛盾,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下的社会发展状况,与马克思所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类在客观世界面前所处的社会活动状态来看,我们现阶段仍未超越“必然王国”的历史阶段。据此,提高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依然是当务之急。长期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同时推进包括精神文明在内的社会建设。然而,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凸显和爆发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临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我们在继续提高物质生产力的同时,须臾不能忽视精神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针对由社会矛盾诱发的多元精神生活,精神生产必须立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适应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精神生产创造出能够反映现代社会生活的思想理论、道德风尚、科学艺术等产品形式,才能从思想观念上引领社会大众的精神状态。当社会大众对主流价值观保持高度认同,那么有效整合共同利益就会变得轻而易举,消除不同利益诉求导致的价值分歧就显得水到渠成,从而有助于消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我国追求共同富裕的历程而言,精神生产在新阶段具有新使命。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人民获得了追求共同富裕的政治身份和准入资格;通过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人民从物质富裕方面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在新时代,以精神生产引领现代社会的精 神面貌,从精神富裕方面将共同富裕的内涵完整呈现出来。实现物质生活富裕与精神生活富裕的同频共振、协调均衡,追求社会成员在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是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举措。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精神生产的全过程,能够确保精神生产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将真善美的精神产品贯穿引领社会风尚之中。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和提升社会成员的思想信念、道德理想、审美情趣,才能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的侵袭,构建美好精神家园,创造美好生活。

二是返本朝元——精神生产加强党的领导,彰显民族振兴的文化自信。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党要在精神生产中居于领导和核心地位,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深深浸入人们的血液之中,同时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互作用,它们承载的厚重历史文化内涵,无疑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凝聚的文化,蕴含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独特思想与精神风貌。社会主义精神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党和人民坚持历史思维和世界眼光。党带领中国人民先后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跃迁,而这个“强起来”不仅是物质上的强盛,还应该具有精神上的挺立。党引领人民对传统文化实现合理继承与积极创新,以达到思维创造和精神升华;同时,主动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进而转化为我国发展进步的有益资源。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要积极展开与世界文明的交往对话,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为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之一,“两个结合”为厚植精神生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带来契机。精神生产既要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又要在时代发展中赋予其新的内容,做到精神生产的与时俱进和守正创新。一方面,精神生产要扎根中国大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当今中国文化的“塔式结构”,这规定了精神生产得以依循的三个维度,从而呈现出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画卷。精神生产要“书写新时代”,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积极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另一方面,精神生产要传播中国声音。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语境下,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逐渐紧迫。我们要获得掷地有声的国际话语权,关键是推动本国文化“走出去”,提升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认知度。唯有“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12],才能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三是因时而新——精神生产坚持人民至上,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需求。所有的精神文化产品,归根结底都是人民群众对现实生活的观念反映,它们来源于群众并服务于群众。现实的个人联合起来组成社会,在生产交往中形成超越个人的共同利益和精神追求,这就构成精神生产的主要内容。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精神,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蒸蒸日上,也相应地需要反映这一社会现实的精神产品,以表达民众“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积极奋斗面貌。本质上,精神生产以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为根本,而非纯粹追求市场的资本利润,甚至旨在获取利润而一味迎合市场风向,进而导致精神文化产品降低自身的社会价值。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迅速增长,呈现多层次、多形式、多样化的特点,文化消费能力大大增强,欣赏水平不断提高。因此,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应着力引导社会的精神文化朝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方向发展。唯有立足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来进行精神文化创造,反映人民群众真实的精神需要,丰富和完善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才能让增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切思想源泉充分涌流。

针对大数据和自媒体时代精神文化产品的价值理性弱化问题,数字化的精神生产应回归人文意蕴和价值关怀。精神生活要实现共同富裕,富裕是前提和基础,它不能在算法推送和数字分析中走向贫瘠,一切的形式都必须为内容服务。新的精神生产方式确实为丰富人类精神家园带来触手可及的便利,但数字技术的运用终究要服务于人的精神生活。为此,要推动形成良好的数字文化生态,提升数字精神产品的服务品质,警惕抽象的数字产品以虚拟手段掩盖真实的社会生活,真正做到用现代技术为精神生产赋能。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的真实需要,就是使人民在精神产品的消费中切实有体验感和获得感,将精神生产原本的人文意蕴与价值关怀体现出来,使人实现精神生活的主体回归。

四是因势而动——精神生产健全社会共享,推进社会成员的发展进程。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及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时,曾从文学的民族性到世界性这一经验层面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3](P35)。实现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本质上需要精神生产的共享发展。我们应从社会公共产品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精神文化,其公共属性决定了它的共享价值,这就意味着精神生产的成果也要由人民共享,让精神文化产品真正惠及全体社会成员。“建立健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共享机制是保障人民共享精神文化资源、产品与服务的重要举措”^[14],为此,推进精神生产的社会共享发展显得尤为重要。畅通共建与共享的渠道,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模式,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精神生产领域得以贯穿,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此外,防范资本力量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裹挟操纵,让更多文化精品“飞入寻常百姓家”。如果全体社会成员都能自由地享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则意味着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到21世纪中叶,中国人民以物质共富和精神共富“两条腿走路”的坚定姿态,必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行稳致远。

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的相关阐说,深刻地指明精神生产和精神文化生活的诸多原则,这在我们当前追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中产生巨大的理论回响。在各种精神文化产品良莠不齐、多元社会思潮激烈交锋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在唯物史观视野中重新审视精神生产,开掘它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之间的巨大理论空间,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为社会发展注入一股强大的精神生产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们应繁荣发展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使每一个人在物质和精神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上,共享社会公共文化产品的精神食粮,真正达到自由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 黑格尔. 历史哲学. 王造时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 [2] 黑格尔. 美学: 第3卷下. 朱光潜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8.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8]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9] 袁贵仁. 价值学引论.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 [10]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11]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12]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强调 高擎民族精神火炬 吹响时代前进号角 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文艺高峰. 人民日报, 2016-12-01.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4] 项久雨, 马亚军. 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层次结构与实现进路. 思想理论教育, 2022, (6).

The Logic and Path from Marx's "Spiritual Production" to Common Prosperity in Terms of Meeting People's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Lu Deyou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Jiang J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bstract As a higher form of spiritual life, common prosperity in terms of meeting people's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signifies the flourishing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Karl Marx examined spiritual production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of social production, providing an important category to facilitat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l society and constructing of human real life, as well as scientific prediction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spiritual production. Spiritual production exhibits enormous social value in terms of human cognitive activities, human subjectivity, and human historical process. In New Era, spiritual production need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spiritual and cultural products, achieving the internal unity of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s and returning to the origins while adapting with the times and trends, so as to realiz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spiritual life and advance people's well-round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Marx; spiritual production; common prosperity in terms of meeting people's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
- 作者简介 卢德友,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贵州 贵阳 550025;
姜 婧, 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江苏 南京 210094。
- 责任编辑 涂文迁